

海外华侨与民初捍卫共和的斗争

郭 梁

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3月袁世凯窃居总统职位,到1916年6月袁氏死去,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激烈斗争,这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进步力量一起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共和制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外华侨是孙中山革命派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为捍卫共和、反对专制独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功绩并不亚于在辛亥革命中所作的贡献。历史雄辩地说明,华侨是近代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捍卫民主共和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斗争精神,是近代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次大发扬。

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反袁斗争

武昌首义一声枪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中国各阶层中激起的民主主义波澜,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取得的显著成果。然而,辛亥革命毕竟还是失败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更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结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挟仗北洋六镇的兵力,迫使政治上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向他妥协,窃夺了中央政权。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辞去自己的临时大总统职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夭亡了,辛亥革命放射出的耀眼光芒一闪即过,神州大地仍是一片黑暗。

对袁世凯的真面目,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没有真正认识,他们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当孙中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的消息传到海外,华侨纷纷函电表示反对,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复函详加解释说:“扑满清而建民国,今目的已达”。而袁“其诺甚濡,其言弥信。”今后“宜观其从容敷施,以行国民之意”^①,革命派也企图以“与宪法等”的“临时约法”制约袁的言行。但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懂得“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②袁氏篡夺政权后,很快脱下了“拥护共和”的伪装,专制独裁,镇压革命势力,一纸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对他没有产生丝毫约束作用。1913

年袁世凯派特务刺杀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但宋案并未使国民党领导人都惊醒过来,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兴师讨袁,国民党内部对此却有严重分歧,人心涣散。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退让,步步进逼,他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得到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作为对国民党用兵的经费,准备发动内战。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撑腰,袁世凯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猛扑过来,辱骂孙中山、黄兴等是“除捣乱外无本领的‘乱党’,‘逆首’”,要举兵征伐。接着,在6月9日至30日,又先后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的都督职务,并派兵南下。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终于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讨伐袁世凯。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相继响应,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揭起讨袁旗帜,并与袁军发生激战。然而,讨袁军兵力薄弱,各自为战,又加之军费缺欠,在袁世凯的大军进攻之下,各独立省份地盘沦丧,迅速落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亦宣告失败,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再度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并收买笼络培植自身的势力。1913年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5月1日,袁氏又颁布袁记新“约法”,废除1912年所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成果、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国会、临时约法已被袁世凯全部毁灭。12月,袁世凯公布“修正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一规定,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其子孙后代也可以继任总统。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同时达成一项默契,日本赞成袁世凯做皇帝。孙中山先生当时曾经尖锐地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指出“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③袁世凯并不满足做个“临时大总统”,他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帝制的活动,急于要“黄袍加身”。他废除内阁总理制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同时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独揽军政大权,“政事堂”和“办事处”,一文一武,正是袁世凯进行独裁统治的左右手。袁氏又恢复封建帝制时代的官名和官阶。他还授意拼凑了“筹安全”、“国民代表大会”等袁记御用机构组织,制造了形形色色的所谓“民意”团体,鼓吹帝制,同时大搞尊孔复古活动,为其“变更国体”制造舆论。经过一番丑恶表演后,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中华帝国”帝位,并下令从1916年元月起改为“洪宪”年号,准备正式即皇帝位。

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罪行,他窃夺政权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无比愤慨。在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前后,国内各地人民和海外侨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的称帝丑剧,更是不得人心。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全国各地反抗怒潮风起云涌,许多省份都爆发了反袁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酝酿,发动了大规模的讨袁护国战争,在此形势下,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的统治。海外华侨在愤怒谴责、声讨袁世凯罪行的同时,以巨大的革命热情,支持以孙中

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讨袁斗争,支持蔡锷、李烈钧、熊克武领导的“护国军”,为民初捍卫共和的斗争再建伟大功绩。

二,中华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的发展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进入了更加困难的时期。绝大部分反袁的国民党人亡命海外,多数流亡日本,有的则去了欧洲或南洋一带。孙中山痛感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①流亡海外的党员,对于形势的看法,对于应采取的战略策略,都有严重分歧,无法统一。孙中山决定解散涣散无力的国民党,重新创建有战斗力的中华革命党。振作精神,筹备“三次革命”,以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先生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发展了第一批中华革命党员,受到孙中山的鼓励和感召,海内外许多革命党人增强了再举革命的信心,纷纷加入中华革命党队伍。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在南洋和美洲的华侨中发展党员。辛亥革命后,海外同盟会组织先后更名为国民党支部,当时,国民党海外支部多数还存在。孙中山最初计划将国民党海外支部也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后因不便利筹餉,不便于向当地政府立案注册,仍沿用国民党海外支部名义,但实行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宗旨,“内容组织则更高长之。”1914年2月4日,孙中山致函南洋革命党人,告以已在东京积极策划组织新党讨袁。4月18日,致函南洋华侨、革命党人邓泽如、李源水等人,告以建立中华革命党的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并说明中华革命党的宗旨:“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以邓泽如久居南洋声誉素著,请具本此宗旨,在南洋各埠设立支部,以振党势。”^②6月15日,又致函槟榔屿华侨陈新政,强调此次立党与以前办法颇为不同,“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条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并称“本党系秘密结党”,介绍党员要审慎,不必大张旗鼓。^③在孙中山的指导、关怀下,华侨革命党人邓泽如先后到了南洋各地,成立中华革命党支部、分部。许多海外同盟会员,成为各支部、分部的重要骨干力量,例如邓泽如、郑螺生、陈占梅、彭泽民、邓子瑜、黄景南、黄隆生等人,分别负责本地区筹建中华革命党事务,积极在海外扩展组织,汇集反袁力量。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先生就任总理职务。在总部的直接指导下,国内18个省成立了支部,同时迅速派遣党内骨干分子分赴海外华侨中筹建支部,点燃反袁革命烈火,负责筹集革命经费、宣传革命主张。在他们的活动下,美洲的《民口杂志》、新加坡的《国民日报》相继发行,从而“使本党之主义得以益明,袁世凯之恶得以尽暴”^④。孙中山于7月29日致函南洋各埠洪门组织,介绍中华革命党组织状况。9月1日,中华革命党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经解散者

“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指出这次组党办法，“务在正本清源”，克服“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摒斥官僚”和“淘汰伪革命党”。通过他们的组织和宣传，不仅在南洋各地，而且从亚洲到欧洲，从澳洲到南非，从北美洲到中南美洲，都建立起了中华革命党的支部或分部，甚至在航行于太平洋的轮船上，也发展了中华革命党组织。这一时期，先后在海外建立了三十九个支部和四十五个支部，中华革命党新党员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一万多人。新加坡、马来亚的中华革命党发展到十一个支部和二十九个分部。海外华侨成为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基础。当然，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中的中坚人物，由于受到国内国民党人“急进派”与“缓进派”的不同影响，对孙中山发动的“三次革命”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感召下，许多海外老同盟会员从爱国主义出发，信服孙中山，热情不减，积极投入了反袁反军阀斗争，成为海外各地中华革命党的领导骨干，例如新加坡支部长张永福，副支部长陈楚楠，檳榔屿支部长陈新政，巴城支部长沈选清，暹罗支部长肖佛成，怡朗支部长陈民钟，缅甸支部长寸海亭等等；马来亚华侨邓泽如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以南洋英荷两属地筹款事宜相托，后又改任南洋各埠筹款委员长。孙中山先生还委任陈楚楠为新加坡筹饷委员，邓子瑜为南洋荷属筹饷委员，饶潜川为仰光筹饷局长等。中华革命党在海外的的发展，也得到了一般华侨同胞的热情支持，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更系难能可贵，非常感人。侨居波士顿的华侨总计 70 余人，从 1915 年 6 月 14 日波士顿分部成立时起，华侨踊跃加入中华革命党，到 1916 年时，该埠华侨已全部加盟^⑧。辛亥革命后，美洲致公堂曾一度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生误会，抱着不合作态度，后经孙中山派冯自由等人进行宣传解释，致公堂转变了态度，“热诚如昨”，成为孙中山“再张旗鼓之先声。”^⑨1915 年 7 月 5 日，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全美洲同志恳亲大会，声势浩大，盛况空前，是一次反袁誓师大会，世界各地有 200 多处派代表与会，共商反袁计划，充分显示了爱国华侨支持声援国内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

三、华侨筹饷募款的奋斗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已失去国内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备尝艰苦、困苦颠连”。1913 年 12 月，孙中山曾致函给邓泽如以及南洋的国民党人，告以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在衣食上发生困难的窘况：“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京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⑩因此，解决反袁斗争的财源问题，便成为革命党人首要的紧迫任务。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无论是南洋所属海外支部，还是美洲各支部，都以筹募第三次军饷为唯一急务。筹饷的对象是广大海外华侨，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建立了负责筹饷的总机关

——筹饷总局，订立了详细的筹款章程。筹款办法是由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总部印制债券，发给捐款者作为凭据，债券的发行、偿还均以日元计算，债券分为十元、百元、千元三种。依照“筹饷局奖励章程”规定：“凡资助革命，不论出资多寡，均照第一次革命办法，两倍偿还，限期革命成功后三年内，与第一次之款一并偿还。”规定凡资助万元者，每次奖一等金质功章一枚，革命成功后有经营矿山及各种实业的优先权，政府承认公民代表，参于政事、组织国会；凡助资千元者，每次奖二等银质功章一枚，革命成功后，有经营矿山及各种实业优先权，并按照中华革命党员待遇，享有公民权；凡出资百元者，奖三等铜质功章一枚，按照中华革命党员待遇，赋予公民权。这些筹款和奖励办法，对动员海外侨胞捐款反袁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真正热心的捐款者，并不是从这里获得动力的。

1914年9月，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对这位在辛亥革命中“效死毋辞”的华侨中坚分子寄予了最殷切的希望，后因邓泽如认为南洋各地筹款事务最忙，不及照顾东京职务，坚辞不就，于是孙中山在同年12月28日改委任邓泽如为南洋各埠筹款委员长。在1915年2月另委任张人傑、廖仲凯为中华革命党本部财政部正、副部长。筹款工作是艰辛的，华侨的反应虽然热烈，但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华侨商业受到影响，少数热心同志也应付已疲。为了尽快解决中华革命党策动反袁斗争用财之急，孙中山又多次派出中华革命党干部赴南洋各地筹款，并协助发展党务，他们得到邓泽如、郑螺生等爱国侨胞的鼎力支持，筹款工作也随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取得进展。

为了讨伐袁世凯的心腹走狗、广东将军龙济光，革命党人朱执信在1914年9月中旬曾到南洋马来亚各地筹款，历时二十余天。朱表示孙中山任命邓铿（仲元）主持广东讨袁等事，其本人系与邓铿共谋发难，事机已迫，无款不能办事。在新加坡、吉隆坡、埧罗、檳城以及芙蓉、过挂罗、庇胜、麻六甲、麻坡等地，朱执信筹款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南洋商业不景气，但各地侨胞仍然踊跃认捐，仅怡保一地就筹募二万元，加上香港、安南等地的筹款及借款，共筹得五万四千八百余元。朱执信曾致函霹雳埠中华革命党负责人郑螺生、李源水，感谢南洋侨胞的热情捐输，信中说：“……弟此次南来，适当开战之后，各同志均於商业凋残之际，倾产相助，衷心感佩，非楮墨所能罄。”^①

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后，激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致函南洋华侨匡慎刚、邓泽如，指出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后必将称帝，应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倒袁斗争。又致函叶独醒等人，请为筹款，以助军饷。为了应付东京中华革命党总部的急需，孙中山曾嘱变卖檳城原属同盟会支部的房产作为反袁活动经费。11月6日，孙中山特函告马来亚吉隆坡侨胞，各地革命军即将全面发动武力讨袁，“现已规划大举，除陕蜀已动外，滇、黔、湘、鄂、宁、皖皆已遣人深入，一月内可动，望竭力筹济。”^②11月12日，中华革命党总部派赴南洋筹款的许崇智、邓铿、郑鹤年三人抵达新加坡，开始了在南洋的劝购活动。他们共携带有458,200元（日币）的公债券，在邓泽如等人的安排协助

下,所到之处,向侨胞宣传演讲,劝购公债,华侨一再慷慨解囊,踊跃认购。在马来亚埧罗时,他们与区慎刚、郑螺生、黄心持等十人共商筹款办法,区慎刚认购公债一万元,黄心持认购三千元,其余各位都认购公债千元以上。经过邓泽如等多位爱国侨胞的努力,南洋华侨实际认购的公债券已达到 323,623 元,占这批公债券总数的 70%。^⑨这一时期的筹款,新、马中华革命党筹得的数目最为可观,共获得日金 76,000 元,英洋 237,000 元,其中英洋的数目即占当时世界各地侨胞筹款总数(约 112 万英洋)的百分之二十。^⑩中华革命党在美洲的筹款也取得巨大成绩。孙中山任命林森为美洲的筹款委员长,在旧金山成立了民国维持会,作为南北美洲筹款总机关。据统计,自 1914 年 7 月 6 日至 1916 年 2 月,经民国维持会捐款输饷者遍及美洲一百五十多个城市,约 24,000 余人,捐款金额达 204,651.98 美元,汇交东京中华革命党总部,另由林森亲自带回国 18 万元。

1915 年 12 月 25 日,蔡锷、李烈钧领导的护国军起兵讨袁,消息传到海外,广大侨胞汇出巨款支援护国军。孙中山先生致书南洋华侨,鼓励各地筹饷局,速催未汇之款,以备军用。起义之初,经费异常困难,华侨的经费支持成为主要饷源,蔡锷致梁启超“告滇省独立经过书”中说:“滇经济极穷乏,近得侨商之接济二十万,尚有三十万可耐日汇滇,但非大寄款项到手,不特难以展佈,现局亦难支持……”^⑪。李烈钧等“致南洋华侨书”中说:“此间南中侨胞,闻滇中义师爆发,皆引领宗邦,欢欣踊跃,近日来电称贺,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更呼吁海外侨胞继续“迅集巨金,慨输义饷,饱腾士马,共赴戎机”。^⑫当护国军第三旅、第四旅出发时,“得南洋华侨助款现金 65 万,并由某处运到步枪、山陆炮各军需品多件,此间军人,兴高采烈。”^⑬当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分率军队向四川、广西进发时,爱国华侨又“电汇一百余万”,“美洲华侨、澳洲华侨来电认捐,闻数在二百万左右。”^⑭其它地方如广东的讨袁武装斗争,也完全依靠华侨的捐款作为财源。据朱执信记载:“1916 年广东各地中华革命军总数约一万七千余人,大小数十战,支持达四、五个月之久,及袁世凯败亡,解散之日不索公家一钱,所费数十万元,皆由华侨所筹助。”^⑮

海外侨胞捐款支持反袁斗争,不仅数量大,地区广,而且爱国热情不减当年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他们“或数千元,数万元,或十数万元不等,而不是捐了一次即便中止,而是不断地捐,不断地寄,源源而来”。^⑯中华革命党的海外骨干分子,除积极劝捐筹款外,本身也都热心捐献,具有毁家纾难的革命奉献精神。马来亚霹雳的区慎刚、梁燦南,安南堤岸的黄景南,西贡的李卓峰、曾锡南、冯培生,暹罗的肖佛成,梭罗的李佑倬,泗水的曾国聪、朱遐九等侨胞,分别捐献了万元乃至十万元以上的巨款,为当时所罕见。莫律宾华侨工人刘谦祥,虽然能力有限,却倾囊相助,将他全年工薪 1000 元全部捐献,使孙中山深受感动,特专函嘉勉。爪哇三宝瓏华侨发动募集爱国基金支持反袁斗争,在短期内就募集了十五万盾以上,其中约有一万盾是由华侨妇女委员会负责募集的,少年儿童们也不落后,天演社歌剧筹款会将演出所得全部捐献。云南起义后,华侨认捐热情高涨,捐献巨款者大不乏人,连留

法学生爪哇华侨吴佛康也捐了四千元。

在整个反袁斗争期间,海外华侨究竟捐了多少款支持国内革命,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尚无法统计出一个较为确实的数字。但经过中华革命党总部经手的海外捐款,据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人傑于1917年1月30日公布,从海外华侨中筹款总数为日币170余万元。此外,还有朱执信、邓仲元经手的讨伐龙济光之役的海外捐款5万余元。^⑥

四,华侨讨袁武装及其斗争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迅速派员赴南洋、美洲进行讨袁宣传、筹集款项,还先后派遣数百名骨干份子潜回国内,在各地策划反袁军事行动,致力于武力讨袁,以期“一举即达吾党素志。”^⑦

随着国内讨袁斗争的兴起,海外华侨在热烈响应孙中山号召捐款助饷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投入军事斗争,组织军事团体,学习军事知识,培养军事人才,并进而在海外建立讨袁敢死先锋队,逐日操练,准备回国奔赴讨袁战场。

1915年元月,美国贝城建立了“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由中华革命党人冯自由任社长,伍横贯任教务长,招收华侨爱国青年进行培训,依照陆军兵官学校择要教授课程,“专以养成美洲民党势血健儿,指挥队伍,驱除国贼之学识。”^⑧1916年,伍横贯曾率领该社多名华侨青年回国效命,投入了山东的反袁武装斗争。

1915年4月,加拿大华侨也组织了军事社,以培训华侨青年。军事总社设在间顿城,当地华侨中华革命党员数百人参加,多为青年工人、店员,白天做工,晚上训练。军事总社还相继在加拿大的沙市加寸城、维多利亚、温哥华、列必珠以及多伦多等城市筹组了军事分社,以训练华侨军事人才。中华革命党东京军事部与华侨军事社联系密切,寄赠四十册周应时著的《兵站要略》给加拿大列必珠军事分社。^⑨

大力培养航空人材,应用最新军事技术,为讨逆出力,是这一时期海外华侨致力于武力讨袁,进行军事训练准备的重要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华侨冯如曾于1911年带着自制飞机回国,支持革命光复斗争,不幸于1912年飞机失事遇难,这是华侨实现航空救国理想的先声。为了捍卫共和制,铲除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政权,美洲华侨又在海外兴起了航空救国的热潮。1915年,孙中山命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创立航空学校,任命黄伯耀为校长,1916年“美洲飞行学校”在雷德伍德城(又称列活埠)正式成立,聘请美国教练,设驾驶、建造、机械修理三科,招收华侨青年入校受训。另外还有数十位华侨青年受国民党美洲支部和华侨爱国团体资助,进入美国航空学校学习,或接受航空训练。加拿大华侨在沙市加寸市创设了“强华飞行学校”,在维多利亚斯解磨城成立航空队,都聘请外国教练,

许多优秀华侨青年报名参加学习飞行。美洲华侨青年先后回国服务者有杨仙逸、陈庆云等数十人。虽然他们学成回国服务时已是1917年，未赶上讨伐袁世凯的战斗，但他们仍然为保卫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为打击军阀势力而驾机参战，立下了不少战功。例如，1918年，杨仙逸回国后，奉孙中山之命，组建飞行队。1919年，他任援闽粤军飞行队总队长。还有美洲华侨张惠长、陈庆云、叶少毅等人在援闽粤军中担任飞行员。1919年7月叶少毅在驾机出征中失事牺牲，1920年讨伐军阀莫新荣时，杨仙逸、张惠长等驾机轰炸莫新荣盘踞的广州观音山，莫仓惶逃走，广州亦告收复，孙中山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922年，杨仙逸被任命为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之后，他又多次率飞行队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1923年，他因试验水雷而牺牲。孙中山先生闻讯后痛心不已，亲自为他题写墓碑，并以大元帅名义，追认杨仙逸为中将。除了美洲，中华革命党还在日本创办过飞行训练班，聘请日本人坂本寿一为教练，培养飞行技术人员。1916年5月，飞行训练班学员、教练携三架飞机，从日本乘船抵青岛，进入潍县地区，被编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航空队”服务，不久就参加了计划袭击济南的军事行动。革命军飞机在济南上空观察地形、散发传单、投放炸弹，山东的亲袁军队惊恐万状、人心惶惶。另外日本神户华侨杨寿彭也曾接受孙中山指示，在日本洽购飞机，并派具有熟练驾机技术的杨永安随机回国服务。总之，为着拯国救民，为着中华民族的富强，华侨曾在海外为祖国培养了最早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可谓近代中国航空的先驱之一。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领导的护国军在云南起义后，全国各地声讨洪宪帝制，响应讨袁，风起云涌，大批海外华侨回国从军。许多华侨战斗在讨袁前线，有的甚至为捍卫共和制献出了生命。回国参加讨袁武装斗争的华侨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在广东，以南洋各地回国的华侨为主，也有美洲、日本等地的华侨参加；另一部在山东，以美国、加拿大回国的华侨为主，也有南洋等地回国的华侨参加队伍。

广东曾是孙中山“推翻清廷，创立民国”，从事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锐意进取广东，以作为讨袁斗争的根据地。因此这里讨袁斗争发动较早，经历战斗多，华侨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1914年10月至11日，由中华革命党人朱执信、邓铿领导的讨伐龙济光之役，华侨邓子瑜任广东东江别动队司令，率众一千余人在博罗举事响应。讨龙起义失败后，马来亚霹雳华侨钟明光激于义愤，与革命党人李作汉等人在广州结义，组成暗杀团，专以刺杀龙济光为己任。1915年7月17日，钟明光“托名摆卖滴酸菜为业”，^⑨潜伏在龙济光必经之路。当龙一行出现时，钟明光从容扔出炸弹，当场炸死龙的卫士十七人，炸伤龙的左腿，钟明光不幸被捕，慷慨就义。钟明光的壮烈之举轰动全国，革命党和人民群众为之振奋，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则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1916年2月，在黄埔港发生的第二次夺取“肇和舰”的起义中，有华侨决死队11人参加，起义失败后，指挥者马伯麟、铁血团员郑慕开以及六名

华侨敢死队员被捕,除马伯麟外,全部殉难牺牲。1916年4月,在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汕头的战斗中,华侨敢死队“又以数十人往攻汕头镇守练署之役,奋勇先登,逐去马存发”,^①汕头起义获胜后,华侨敢死队员“多各归其乡,纠集子弟以助大军。”如吴业刚、李正华等之两攻江门,其功尤著。”^②袁世凯自毙后,其爪牙龙济光仍盘踞广东,华侨敢死队员一部分参加中华革命党邓仲元部,一部分归入周之贞所率领的华侨护国军,继续进行讨伐龙济光的战斗,再次立下了战功。

参加山东讨袁战斗的华侨多归自美洲,以加拿大华侨组成的“华侨义勇军”为主体。1916年1月初国民党加拿大支部颁布“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号召广大爱国侨胞参加敢死队,回国讨伐袁世凯。“先锋队规则”中指出:“国贼纵横,民生涂炭,共和将坠,帝制复萌,正是吾人枕戈待旦,疆场效死,救国之大可时期,杀贼之良善机会。……虽救国有直接间接之分,杀贼有暗助明攻之别,究直接可拽其忿,间接未伸其恨,与其间接呼号,空谈无补,莫若直接效力,实地进行,此吾人组织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之所由起也。”^③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截止1月15日报名期满之日,已有119人参加。经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并命它赴日候命。4月初,全体华侨敢死队员已分批抵达日本横滨集中。在日本时又有一批新队员加入,总数达到500余人。5月,在孙中山所派代表夏重民的带领下,由日本开拔前赴青岛登陆,进入潍县地区,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义勇团,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义勇团团团长夏重民,副团长伍横贯,参谋陈煊。义勇团下辖三个队,第一队队长蔡鹤明,第二队队长李宜民,第三队队长李锐举。有据可查的义勇团名册中,记录了九十三名团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履历等,他们当中除了两人分别是陕西、江西籍外,其余全部为广东籍华侨。年龄最大的团员42岁,最小的仅16岁。华侨义勇团在山东潍县期间,先后参加了袭击济南等战斗。虽然经历的战争较少,“幸尚无损伤,然华侨之勇气热心,益为同志敬重,世人所叹服矣。”^④

讨袁护国战争是符合全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正义战争,得到了包括广大爱国侨胞在内的海内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孙中山一再高度评价海外华侨在讨伐袁世凯、捍卫共和斗争中的重大贡献。

注释:

- ① 转引自《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 ③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273—274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
-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65页。
- ⑤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282—283页,台北,1973年出版。
- ⑥ 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

- ⑦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2篇,第542页。
- ⑧ ⑨ 转引自《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第187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
- ⑩ 《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
- ⑪ 《朱执信先生文集》,第705页,1985年6月,台北出版。
- ⑫ 转引自李守礼“南洋华侨与讨袁运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之海外华人论文集》,第22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 ⑬ 《华侨革命史》(下),第467—472页,台北出版。
- ⑭ 同上,第475—489页
- ⑮ 《革命文献》第45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第346—347页。
- ⑯ 《护国军纪事》第一期。《革命文献》第47集,《讨袁史料》。
- ⑰ 《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
- ⑱ 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第258页
- ⑲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载《革命文献》第五辑,第644—645页。
- ⑳ 转引自《华侨革命史》,第436页。
- ㉑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 ㉒ “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简章”,《革命文献》第45辑第425页。
- ㉓ 胡汉贤《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
- ㉔ 《神州日报》,1915年7月27日。
- ㉕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99页,《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3。
- ㉖ 同上,第400页。
- ㉗ 《革命文献》第45辑,第504—515页。
- ㉘ 《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3。

(上接第56页)

- ① 陶铸在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
- ② 中侨委二届一次全会文件之一。
- ③ 方方《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若干政策》,1956年在中央第四次侨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 ④ 张泉林主编《当代中国教育》102页,1989年,广东版。
- ⑤ 1958年12月8日方方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⑥ 《1959年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侨务报》1958年第12期。
- ⑦ 袁群《在侨务工作中形成社会主义思想大跃进》,《侨务报》,1958年第4期。
- ⑧ 《在侨务工作中形成社会主义思想大跃进》,《侨务报》1958年第四期。
- ⑨ 《云南侨务工作》,《侨务报》1964年第4期。
- ⑩ 侨务报编辑室《批判归侨思想工作的右倾保守倾向》,《侨务报》1958年第4期。